主编:钟华 编辑:陈彬 校对:王心怡
E-mail:daxue@stimes.cn

海外视野

2 月 2 日,历时三天的“中东与北非大学教育峰会”,在位于沙漠绿城艾因市的阿联酋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与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呼吁——

阿拉伯世界需重振人文教育

■郭英剑

MENA 是中东与北非地区的英文简称,就其地理意义而言,包含了从摩洛哥到伊朗的疆界,囊括了所有中东与马格里布国家。因而被称为是“大中东地区”。

《泰晤士高等教育》是英国高教领域的知名刊物。2015 年 2 月 23 日,该刊出面主办了第一次“大学高峰论坛”,会议由卡塔尔的国立大学——卡塔尔大学承办。会议旨在推动中东与北非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泰晤士高等教育》近年来所主办的多项年度系列峰会之一。

对于此次峰会,《泰晤士高等教育》除了要推动阿拉伯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为自己的杂志开辟一个全新的“中东与北非地区大学排行榜”。在这次会议上,专门开设了研讨排行榜的工作坊以及分组讨论会议。直至今天,“《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行榜”已经是获得世界公认的全球大学排名系统之一,其因涵盖了教学、科研、知识传播与国际合作而较为全面地反映一所大学的主要使命而受到赞誉。2015 年的首届会议非常成功。



阿联酋某高校和在此求学的各国学生。

呼吁阿拉伯世界重振人文教育

据报道,2016 年 2 月 2 日召开的第二届中东与北非大学高峰论坛的焦点之一,体现在对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振人文教育这一议题上。值得关注的是,会议是在对当下大学毕业生就业技能表达担忧的基础上,提出了应该反思缺乏人文教育的纯技术与纯技能教育,进而提出了应该加强更宽泛的教育的要求。

与会的大学校长们提出,由于过分关注技术技能,导致中东地区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广博的知识与深刻的理解力,因此,他们一致呼吁,要重新审视伊斯兰世界中的人文教育。

卧龙岗大学迪拜分校前校长韦兰在接受峰会有关人员采访时直言:本地区高校中的科学与工程类课程,内容变得越来越狭隘,已经到了没有任何机会去教学生思考伦理道德与人文精神的地步了。

导致这一问题的缘由,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沙特诺拉公主女子大学的艾尔帅芳院长说,现在的学生都要求课程要讲授职业技能,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在未来的求职市场上会有用。

但在阿曼苏丹卡布斯大学副校长阿比曼尼看来,即便是技术类课程所培养的大学生,也都应该是“人”,而不是机器。

那么,或许我们需要问一句:有技术、无人文,大学生缺乏什么?

技术至上面前,人文何以立足

阿比曼尼说,他认识很多工程师、医生与护士,他们业务熟练,但却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在他看来,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自然在于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他指出,目前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大学的赞助商或者拨款人不允许课程超出技术技能的范畴,这就使得人文类教育在高校竟无立足之地;而另一方面,大学生在校时也不愿意多学此类课程,认为它们无用。

艾尔帅芳认为,高等教育不能屈服于这样的压力。她说,在西方世界,许多科学家所面临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他们依旧坚持专业教育要更加宽泛,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谈到本地区高校所面临的挑战时,艾尔帅芳表示,价值观(values)在本地至关重要……在当今经济动荡、社会变革的时代,价值观同样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让学生懂得:你不需要把所学的东西全都拿去‘应用’。”

对此,卡塔尔大学校长埃尔德海姆深表赞同。他说,学术类专业,应该培养一种自我完善的学生,在其毕业后能够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融入社会。

打造独具一格的人文教育模式

那么,应该如何建设符合阿拉伯世界特征的人文教育呢?艾尔帅芳说,中东地区的高校,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人文教育模式。实际上,也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尽管我们将来的人文教育会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也要探讨如何在我们的专业教育中去灌输我们的伦理道德与伊斯兰的认同感。

与会者认为,高校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是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在这一问题上,埃尔德海姆提出,国立大学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他建议设立一些新的专业,还要为此引入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进而使之能够去迎接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怎样在保持伊斯兰认同感的同时,又成为一个开放的族群。这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而国立大学应该为此肩负起应对挑战的责任来。”埃尔德海姆说。

埃尔德海姆还特别提出,在卡塔尔大学,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技术类专业中,因为这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大都是按照西方模式建设起来的,因此问题还不是很大。倒是人文、社科与伊斯兰研究等领域的专业,需要更为广泛的教育才是当务之急。

峰会的三点启示

中东与北非大学高峰论坛,至少让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面对困境与挑战,大学要承担起教育青年学子的历史责任。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在十七八岁进入大学,到二十一二岁毕业,这一阶段正是其身心和人格成长的重要阶段。因此,应该更多地关注其对各种知识的吸收、知识如何产生智慧、心理的健康、正确的价值观等通识教育,使其能够掌握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并学着承担个人与社会责任——而这恰恰是人文教育的宗旨所在。

第二,作为青年,在大学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仅关注一门或者一种可以维持生计的技术或技能显然是短视行为。对于肩负未来的青年才俊来说,在大学阶段学到如何面对困难,培育信心去迎接挑战,能够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形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顺境中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才能,拥有这样的本领才是更为重要的。因此,高等院校应该为青年人提供这样的机会。同时,也应该顶住来自社会、市场乃至学生的压力,为学生的未来着想,力争把通识教育做好。

第三,即便教给学生的是技术与技能,高校也应重视其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等问题。对于教师来说,虽然谈的是科学、技术与工程,但所面对的学生是“人”,而这些人,即便是在未来只从事科学技术与工程工作,其目的也是为了人类。那么,教给他们如何与人打交道,学会如何迎接挑战,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就充分说明: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工程领域,人文教育同样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记者快评

高考改革的『科目围城』

■陈彬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官网发布了《省教育厅厅长左敏在 2016 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该讲话首次明确山东省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二批考试招生制度试点省份之一,从 2017 年开始高考改革试点。这意味着,2017 年入学、2020 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将首尝只统考数学、语文、外语三门课程的“新政”。

这已经是新世纪以来,山东省高考所进行的第四次高考改革了。此前的三次分别是 2002 年“3+X”(数学、语文、外语 + 文综或理综)、2007 年的“3+X+1”(在此前基础上加入基本能力测试),以及 2014 年的“3+综合”(数学、语文、外语 + 文综或理综)。

这几次改革是否有些眼熟?

从 2002 年至今,山东省的历次高考改革一直在纠结于除“数学、语文、外语”这三大必考科目之外,是否该加入其他科目?该加入怎样的科目?怎样加入科目?再说得通俗些,这几年的改革其实就是在做考试科目的“加减法”。

这样的改革究竟有何意义呢?

毫无疑问,高考改革的科目变化会对学生的高中学习带来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仅限于重点学习哪门学科,哪门学科又可以直接“舍弃”,但学生依然是在唯分数论,学生的课业负担依然不会有减少,学生们依然要为在哪门学科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困扰,而这份精力也依然不会被用在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上。换言之,这种变化给高中教学带来的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干扰”。

纵观国内近年来的高考制度改革,绝大部分改革依然围绕着科目的增减在做文章,似乎所有的改革思路都被困在了一座“科目围城”中,不敢越雷池半步。而在招生制度方面,虽然有些改革已经触及到了现行招生制度的某些核心内容,比如 2014 年上海市春招试行的“一名考生同时被两所高校录取”的招生模式,但大部分改革也没有真正将招考分离,赋予高校和学生真正的自主权。在此背景下,与其时不时做一些改革的表面文章,反倒不如真正踏下心来,针对目前高考招生存在的诸如自主权不足等真正弊病,作一些探索性的努力,这样的价值可能更大一些。

企业兼职教师:想说爱你口难开

■李焦明

当前,高职院校聘请兼职教师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校研究生,由于这部分人处于求学阶段,学业负担繁重,投入教育教学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教学效果远不如在校专职教师;此外就是其他校在职教师,这类教师的教学效果与本校专职教师相差不大。

事实上,相比于以上两类人才,高职院校最希望聘请的是企业人员,然而在这方面,目前呈现的却是“职校这头热,企业那头冷”的状况。

一般而言,学校的教师擅长理论,实践往往是职校的一个短板;而企业工作人员却精于实践。正因为如此,职校盼望着能聘请企业工程师做兼职教师,提高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盼望着能聘请企业工人师傅做实训指导教师,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

然而盈利是企业的目标,办企业也是为了赚钱,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做赔本的买卖。企业派出人员为职校做兼职教师,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工作,影响企业的效益,还会冒极大的商业风险,因为培养的学生不可能全到这家企业工作,这意味着为竞争对手培养人才。所以从企业组织角度来看,企业不愿意自己的人员做兼职。

从企业人员个体来看,由于学校能给予的课时费过低,他们也缺乏积极性。目前高职院校兼职教师的课时费按职称不同有所区别,但大多为 30~70 元 / 课时,一名高级工程师上两节课也最多不过 140 元,但要上好这门课,兼职教师需要备课、写教案、改作业,期末还要出试卷,如果家离学校较远,还要花费不小的时间成本。

此外,学校的上课时间也正是企业的上班时间。企业人员个体不方便来职校兼职。如把学校的上课时间调到双休日或晚上,学生又有意见。

目前一个老师一般可以指导 4~8 个学生毕业设计,指导 1 个学生毕业设计一般为 8 课时。由于指导时间还算灵活,因此企业人员兼职做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还有点积极性。

除积极性不足外,在培养质量上,企业兼职教师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其原因在于兼职教师不是以教学为主业,投入教学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再加上学校对兼职教师的考核是按课时计酬,与教育教学质量无关,因此部分兼职教师教学质量堪忧。在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时,也存在学生在学校找不到企业人员,部分企业人员对学生不管不问、支差应付,学生毕业设计质量不升反降的现象。

鉴于此,要想充分发挥企业兼职教师的作用,高职院校应大幅度提高企业人员兼职教师的课时费,使其具有竞争力。同时加大对兼职教师的考核管理力度,课时费与教学质量挂钩。

目前职校经费紧张,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对职校办学经费的投入,或设企业人员兼职教师课时费专项经费予以资助和扶持。同时,国家要加大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国家职业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协调国务院各部门,出台具体措施,调动企业和企业人员的积极性。如企业派出人员为高职院校做兼职教师可以抵税;企业人员晋升职称不得少于半年的职校兼职教师经历等。

(作者系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教授)

域外传真

白人工人阶层男孩为何不愿读大学

■加思·斯塔尔

在英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普遍在学校表现不佳,也更不愿意读大学。本月早期,英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大学的新政策,要求大学对较贫穷地区的人口加大工作力度,尤其关注工人阶层中的白人男孩。

有些言论暗示,工人阶层在 16 岁之后的教育参与度比例低,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较为贫穷。这是一种可悲的简单化论调。尽管政府一直坚持认为,学校应该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但我们知道,意愿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表象。在理解工人阶层中的年轻人是如何构建他们的意愿时,我们必须考虑可以促使社会流动的那些复杂且具有身份特征的工作,这些受到学校、家庭乃至邻居的影响。我在南伦敦地区教书时,白人工人阶级的男孩(英国道德体系中表现最差的群体)对未来究竟有何向往?他们又是如何把自己视为有价值的个人?这一课题让我十分感兴趣。

我花费一年时间研究了 23 名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他们来自伦敦的三所学校,我希望探索他们如何理解和激励自己。这些年轻人主要居住在政府所属的公寓中,而且符合享受免费校餐的政策,另外他们还具有复合性的学术能力。

这些调查参与者中的多数主要在学校构建自身身份认同,但是这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缺乏教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尤其是 16 岁之后的生活里,学校却是特别重要且有力的存在。

尽管这些男孩的愿望大多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优秀成绩,但却常常事与愿违。我的一个受访者——乔治说:“我的确希望脱颖而出,希望人们能够认为我很聪明,但我并不希望因此而成为一个令人尴尬的人。”

汤姆是另一名参与者。他试图通过从“坏学生”向“好学生”的转变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他也十分看重同辈参与:“我不希望大家都知道我在努力。尤其是老师们。我更不希望他们告诉所有人。我希望将我很努力这件事保持在一个私人状态。”

这些男孩们希望成为中产阶级,既不下降也不要上升,他们希望成为同辈中的“普通人”——尽管他们所在的学校经常向他们推销一些竞争性和自我满足的观念。

学校采取了一种“学习等于赚钱”的咒语来激励学生。但却经常起到相反的效果,因为这直接与男孩的家庭生活相关。

哈利是这些男孩中的一个,他在许多科目上名列前茅,即将成为他的家庭中第一个读大学的人。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期望:“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特别爱钱,我希望他们认为我也会给予一些回报,我并不是一个贪婪的人。”

许多男孩认同这种平等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展现出的平等主义表达了对“融入”社会的渴望,希望“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没有人比任何人更好”的观念。

男孩们对于社会阶层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当我要求他们审视精英寄宿学校和大学的图景时,绝大多数人都十分着迷,但这些生活方式的差异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安。

丹说:“这些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如果去了那儿,我会不舒服的。”

我说:“会感觉你是一个局外人?”

丹回答道:“是的。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许多男孩认为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特征就是自私和冷漠。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他们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愿望,导致他们在权威面前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如果这些年轻人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他们就即将进入一个陌生的、令人不安的世界。所以他们面对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他们对失败心怀恐惧,对成功同样抱有恐惧之心。

最后,我研究的这些男孩中,大多数人在 16 岁之后还是继续追求某种形式的教育,大多数是职业培训。只有两个人继续上大学,但都是当地的普通大学。他们中的一些渴望安定下来,安家后成为了年轻的父亲。有一个男孩成了一名职业球员,有的做了银行的出纳员,还有几个人从事起了贸易工作,薪水开始大大超过他们曾经的老师。

(作者系南澳大利亚大学教师,韩琨编译)

高教视点

儿科医生荒是怎样造成的

■熊丙奇

进入全面二孩时代,儿科医生的紧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悉,国家卫计委已将此列为 2016 年的工作要点之一。这意味着从 1999 年起停招的儿科学专业将有望时隔 17 年后恢复本科招生,各界对此高度关注。事实上,近日就有多名四川省政协委员联名致信教育部,请求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增大人才培养力度,以缓解儿科医生荒的社会问题。

儿科医生荒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是因高校停招儿科本科专业?还是因儿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很困难,导致医学生不愿意从事儿科工作?如果原因分析不清就冒然针对当前儿科医生匮乏的现状,要求高校招收儿科本科专业,很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考生报考儿科专业并不踊跃,学生毕业后也不愿在儿科就业而转向其他专业。

此外,更重要的问题是,高校开设什么专业,究竟应该由谁说了算?此前全国“一刀切”停招儿科专业是行政指令的结果。可以说,儿科医生荒很大程度是行政手段制造的,现在恢复招收儿科专业如果仍旧用行政手段,不是陷入行政治理的悖论吗?应对儿科医生荒,应该摆脱行政治理思维。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本应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权利,但在具体办学中,高校却没有此项权利,这也是我国高校会在 1999 年后全部停招儿科本科专业的原因。

1998 年,教育部为拓宽专业面,决定在新本科专业目录中不再设儿科本科专业,而各高校设置专业需要依据该目录,因此儿科本科专业也就从招生计划中消失了。对此,教育部门可以解释,这只是拓宽了专业面,要求高校用临床医学专业统一招生、培养,并不是说高校就不再培养儿科人才了。然而,这一措施带来的实际结果就是各高校不再培养儿科专业学生。这足以说明按行政计划设置专业的弊端,某些专业会一哄而上,某些专业则会一夜间消失,不是由各学校根据自身的定位、条件,自主决定设置什么专业。

事实上,政府在高校设置专业时,可以提供社会需求信息服务(如某行业、专业需要多少人才)、政策引导(对社会紧缺专业给予扶持),由高校自主根据扶持政策、需求信息决定是否开设某一专业,却不能代替学校做主,直接介入办学。

然而目前恢复高校儿科专业招生,走的还是行政路线,不是由各高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四川政协委员要求教育部恢复儿科专业,暴露的问题就是高校想开设儿科专业,可是如果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儿科专业就比较困难,最多只能采取临床医学(儿科方向)这样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也需要报教育部审批,因为这不在专业目录之内。

用行政方式可解决快速在高校中恢复建设儿科专业的问题,却不一定能保障培养质量和培养特色,而且还存在严重的隐患——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能真正接轨吗?

行政部门要求高校恢复儿科本科专业招生的理由是,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达 20 万之多,单从数据看,培养儿科医生极为紧迫,但国内医院真需要那么多儿科医生吗?现实情况是,我国不少综合性医院的儿科不断萎缩。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的二、三级医院儿科萎缩现象严重,很多医院 5~10 年没有招过一个新的儿科医生。一些医院关闭儿科是因为实在开不下去了,儿科医生都辞职了。从中可见,儿科医生荒和现有的医疗资源配置有关,患者都要把孩子送到优质的专科医院看病,综合性医院不待见儿科,带来儿科看病难,这和儿科人才培养关系并不大。

假如不解决这一现实情况,加大儿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缓解不了儿科看病难,反而出现另一难——儿科专业学生就业难。反之,如果儿科医生很抢手,实际上儿科人才培养也不太可能萎缩,因为在临床医学这一专业基础上,很多学生可以转儿科,或者专注儿科。

当然,行政部门的设想是,一方面要求综合性医院开设儿科;另一方面要求高校招生儿科本科专业,这就形成“对接”。可是,这仍属于用计划手段调节,市场买不买账还有待观察。计划手段可以让综合性医院开设儿科,也可让高校开设儿科本科专业,但最终要办好儿科门诊、儿科专业,还需要医院和高校充分结合自身条件和社会需要,而不只是从形式上解决问题。要解决实质问题,需要针对综合性医院儿科不断萎缩的现状,采用市场机制配置医学资源。同时,要把包括专业设置自主权在内的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这才能形成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